

# “一國兩制”理論與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

楊允中\*

## 一、前言

“一國兩制”理論的出現、形成與完善，是當今時代哲學社會科學領域最具創新價值的新鮮事物，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憲政與現代法治文明的一項創新與進步。“一國兩制”是伴隨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新政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和制度的基本內涵之一，它無與倫比的創新價值和巨大理論震撼力標誌着當代中華文明和東方智慧的一個制高點。說“一國兩制”理論已成為東方地平綫上的一門顯學，也許並無不當。

實踐充分證明，“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一國兩制’方針，具有強大生命力，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重要組成部分的祖國和平統一道路，具有強大生命力。”<sup>1</sup>在全新形勢下推動“一國兩制”理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系統研究同步進入一個既有廣度又有深度的發展新階段，十分必要也十分迫切。本人不久前不揣冒昧曾公開建議把這個呼之欲出的複合型新學科定位成“一國兩制”學或共贏學(poliwinology)<sup>2</sup>，呼籲從法學、政治學、外交學、軍事學、經濟學、歷史學、社會學、心理學、哲學、美學等基礎學科集思廣益、共同關注。“一國兩制”的形成與發展與認識論、方法論領域的幾個核心概念的創造性運用密切相關，這就是求同存異觀、知行合一觀和對立統一觀，而對立統一觀或對立統一規律更構成唯物辯證法或辯證唯物主義的實質與核心。故此，結合澳門特別行政區生機勃勃的發展現實作些相關思索，也許不失積極意義。

## 二、對立統一規律是唯物辯證法的實質與核心

### (一) 唯物辯證法是人類文明一項標誌性成果

唯物辯證法，或辯證唯物主義(dialectical materialism)是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相統一的新型世界觀和方法論，是關於自然、社會和人類思維發展的基本規律的科學。“物質存在具有無限複雜的多樣性和豐富多彩的運動形式；物質世界處在永恆的運動、變化、發展之中；時間與空間是運動着的物質的存在形式；物質運動有着自身的客觀規律；意識是物質高度發展的產物。”<sup>3</sup>

一方面，要承認社會意識在社會存在發展中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又要明白社會意識歸根結底決定於社會存在，人類社會的發展是由物質力量即生產力的發展決定的。在辯證法認識論的對立統一規律、質量互變規律和否定之否定規律這三個基本規律中，對立統一規律或矛盾發展規律的適用性極為廣泛，因為“統一的物質世界中的萬事萬物都處在相互作用的普遍聯繫之中，都處在不斷產生、不斷消亡的運動、變化和發展的永恆的過程之中。統一物分裂為兩個互相排斥的對立面，對立面之間的相互制約和相互作用是普遍聯繫的最本質的內容，同時又是事物自我發展的根本原因。”<sup>4</sup>無論自然現象還是社會現象，既有異質間的對立統一又有同質間的對立統一，採用一分為二與合二為一的科學方法論進行觀察，既看到正面又看到反面，既看到利又看到弊，既看到得又看到失，令形勢向有利於自己一方轉化，此長彼消，這是掌握行動主動權並獲取事業成功的一個決定性因素，也是積累、提升文化軟實力的需要。惟其如此，才應該大力倡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的學風，才應該不斷擴大知識的積累和永不放

\* 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教授級研究員

鬆的探索創新，既要認真總結客觀規律性又要自覺提升認知與基本思維能力。這本身恰也構成一組對立統一關係。

### (二) 社會和自然界中無所不在的基本規律

上文提及的唯物辯證法，講樸素一點、通俗一點就是力求掌握全面看問題的要領和方法。其中對立統一規律(law of unity of opposites)，即研究對立面的統一和鬥爭的規律尤其值得重視，“它揭示出自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類思維等領域的任何事物都包含着內在的矛盾性，事物內部矛盾推動事物發展。”<sup>5</sup> 其應用範圍極為廣泛，現實生活中識別是非、真假、正負、優劣、得失、進退並進而採取相應行為，亦即矛盾解決過程、結構優化過程、效益增多過程均體現對立統一規律。“物質與意識、運動與靜止、時間與空間、鬥爭與統一、質與量、肯定與否定，以及原因與結果、必然性與偶然性、可能性與現實性、內容與形式、本質與現象等等，這些範疇都是對立的統一。”<sup>6</sup>

相對與絕對的關係是理論界十分在意的一組對立統一辯證關係。世界上一切事物既包含有相對的方面，又包含有絕對的方面，既具相對性又具絕對性。“沒有絕對，就沒有相對；沒有相對，也就無所謂絕對。二者互為存在的前提。”<sup>7</sup> 相對與絕對有多種表現：“運動是絕對的，靜止是相對的；矛盾的普遍性是絕對的，矛盾的特殊性是相對的；時間、空間的無限性是絕對的，有限性是相對的”<sup>8</sup>等等。

和諧是不同階層、不同利益團體和個體之間關係協調達致的對立統一，友誼是不同際遇、不同修養人士之間情感交流的對立統一，公平主要是利益交換雙方之間互有所求的對立統一，民主則可理解為權利主體在權利行使上的對立統一。一部交響樂是不同樂器之間、指揮與演奏家之間、剛與柔之間的對立統一；一件受歡迎的產品是產品性能卓越與市場定位科學之間的對立統一；一個令人羨慕的健康體魄是良好生理機能與良好心理素質之間的對立統一；一位受尊敬的學者是其領先學術造詣與崇高人格之間的對立統一。人類社會本身由男性與女性組成也是典型的對立統一。不同社會地位、不同背景、不同性別青年戀愛結婚是原有兩個家庭間的對立統一，結婚後寶寶出生是這兩位年輕父母之間的對立統一成果。世界上最突出的對立統一莫過於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社會制度同時存在並和平發展的客觀現實。

### (三) 中國歷史上不缺辯證法大師

在中國五千年文明史上關注辯證法、踐行辯證法的政治家、思想家不計其數。下面從法制史角度作些粗綫條觀察。

長期以來在中外法制史學者中存在一種較為流行的觀點，那就是中國封建社會“有刑無法”，其統治只得靠嚴刑酷法來維持。這實為以訛傳訛，典型的誤判誤導。中華文明史淵遠流長，歷代統治者治國理政方針雖有差異，但力求制度完善、理念完善卻具有頗高共同性。早在三千年前的西周時代，周公便提出“明德慎罰”、“制禮作樂”的政治主張，作為國家管理的指導思想。二千五百年前，春秋戰國時代，孔子主張禮治和德治，強調“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荀子以儒為本兼採眾長，提出隆禮重法思想。韓非子集法家思想大成，提出“以法為教、以吏為師”主張，強調“信賞必罰、厚賞重罰”。老子崇尚自然，主張“以道統法、無為而治”，“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sup>9</sup> 孔子同時代人子產倡導禮治思想，“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sup>10</sup>，主張德刑統一、寬猛並用，他鑄刑書，成為世界上公佈成文法的先驅。西漢大思想家董仲舒以儒家為主體，吸納法家、陰陽家、道家學說精華，提出“天人感應”學說。<sup>11</sup> 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思想成為千百年來封建統治的主導思想。柳宗元批判儒家“天命神權論”，提出依仁義禮智信而行的中道思想，認同“德主刑輔”的適用性，主張刑禮“其本則和，其用則異。”<sup>12</sup> 朱熹集理學思想大成，提出“存天理、滅人慾”，“德理政刑，相為終始。”<sup>13</sup> 公正執法、不徇私情的包拯認同“德主刑輔”思想，主能立法“於國有利、於民無害”，“法存劃一，國有常格”，執法“紀律自正，則無不治之國。”<sup>14</sup> 張居正力主法制改革，堅持“法在必行，奸無所赦”。<sup>15</sup> 一代清官海瑞執法如山，是明清“懲貪抑霸”一面旗。連西方法學大師孟德斯鳩也不能不承認中國古代立法者“把宗教、法律、風俗、禮儀都混在一起，所有這些東西都是品德。這四者的箴規就是所謂禮教。中國統治就是因為嚴格遵守這些禮教而獲得了成功。”<sup>16</sup>

中國古代文明向來推崇、重視和諧：大至人與自然界的和諧和國家民族間的和諧，小至家庭、鄰里、鄉親間的和諧。和諧本身就是對立雙方經過各種必要手段包括國法、家規的介入而取得的相對平衡，就是矛盾雙方由鬥爭性向同一性的轉換或對立統一的適時達致。歷史上無論西漢“文景之治”還是唐初“貞

觀之治”，無論明初永樂改革還是康乾盛世，無不較好地處理亂與治、禮與法、官與民、中央政權與邊疆之間各種複雜矛盾關係而出現的和諧局面。十八大把體現人與自然界和諧的生態文明建設，同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一起並列為必需長期堅持的五位一體總體發展佈局，是源於對執政規律、建設規律、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總結，源於對特殊國情下建設甚麼樣的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從理論和實踐相結合上作出的系統回應。

#### （四）唯物辯證法的“中國 style”

對立面的統一和鬥爭思想的形成與發展經歷了漫長歷史。作為東方文明核心代表，中國向人類貢獻了數不勝數的大師級人物，推出了可稱之為經典的眾多精闢判斷。俗語“名不見經傳”中的經傳，最初便是指《易經》和《易傳》。《易經》係中國儒家典籍，六經之一。“它承認事物存在着對立面，六十四卦由三十二個對立卦組成，其卦的爻象和爻辭反映了自然界和社會生活中的‘大人’和‘小人’、吉和凶、得和失、益和損、泰和否、既濟和未濟等一系列對立統一的現象，它還承認對立事物的互相轉化。”<sup>17</sup>《易傳》係中國儒家學者對《易經》所作的解釋。它承認世界處於不斷的運動變化之中，並且有其永恆規律；認為天地萬物到人類社會都存在着對立統一的關係。“一陰一陽謂之道”說明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重性，對立面的相互作用是事物變化的普遍法則和萬物化生的泉源：“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說明事物必須經過變革才有發展的前途。<sup>18</sup>

老子認為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都是變動不居的。他觀察到天地間萬物萬事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兩個對立面，例如有無、剛柔、強弱、福禍、興廢等等，它們都是互相依存、互相聯結的。所以說：“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表明了對立面雙方的同一性。<sup>19</sup>《孫子兵法》強調“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不戰而屈人之兵”、“出其不意，攻其不備”，這些原則至今充滿軍事戰略家的智慧光輝。諸葛亮勵精圖治、賞罰嚴明、神機妙算，靠大勇更靠大智，辯證地解決了戰爭和國家管理上的諸多難題，被民間廣泛譽為“天下奇才”和“智神”。

在當代，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把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推向一個全新水平。他的《矛盾論》從兩種宇宙觀、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鬥

爭性、對抗性在矛盾中的地位等方面，深刻地闡述了對立統一規律，發揮了對立統一規律是辯證法的實質和核心的思想。<sup>20</sup>

鄧小平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在新的實踐基礎上繼承前人又突破陳規，開拓了經典理論新境界。

“鄧小平理論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基本成果，抓住甚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深刻地揭示社會主義的本質，把對社會主義認識提高到新的科學水平。”<sup>21</sup>鄧小平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特別是“一國兩制”理論，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社會制度的對抗、衝突、鬥爭推向可以用求同存異、互利共贏的嶄新思維加以解決的新模式新格局，不僅使歷史遺留的某些複雜問題迎刃而解，而且把傳統的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推向一個歷史發展新階段。

### 三、提升文化自覺性， 拓展對立統一規律應用面

理論來源於實踐，來源於對實踐規律的科學認知。而且“實踐發展永無止境，認識真理永無止境，理論創新永無止境。”<sup>22</sup>一個文明國度，一個文化傳統悠久的民族，在理論探索和認知自我完善上從來未曾放鬆過。一位旅法學者講得好：“當回顧歷史，環顧全球，只要尊重客觀事實，就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今天的制度不僅是百多年來中國最成功的制度，也是60年總體看來全球表現最佳的制度。”<sup>23</sup>在國家面臨新的發展目標，在民族偉大復興進入新的攻關階段，在“中國夢”正一步步地展現在人們眼前的形勢下，適當普及一下有關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基本知識，不僅必要而且也具迫切性。認知的每一次提升必將伴隨不必要爭拗、不必要衝突的減少，必將伴隨寶貴資源的節省和社會風氣的改善。結合國家實行改革開放新政35年來改天換地巨變，結合“一國兩制”理論日趨成熟，本人認為認同並培育以下幾個涉對立統一規律認識論的基本判斷，是有益而有建設性的。

#### （一）多元無害觀

中國本來就是一個國情十分複雜的發展中大國，改革開放後中與外、新與舊的碰撞、交鋒，權與利、正與邪的鬥爭、衝突，此起彼伏、從未間斷。以至有人講：各種社會現象“外國有的中國都有，外國沒有的中國也不缺。”從某種意義上講，社會發展的

多元化，多種聲音、多種維度、多種訴求、多種表達是進步、文明表現。忠言逆耳，兼聽則明，強有力的公權力機關不應害怕不同聲音的表達，關鍵就在於權力的行使要依法、利民，沒有灰色地帶；更為重要的是要具備高超的判斷、預測、防範、應變意識與能力，亦即把權力套在智慧籠子裏，而不是遇事靠簡單展示肌肉。在擁有高國際化、社會更加寬鬆包容的特別行政區，人們對多元化訴求機制、對民主的多維表達早已見怪不怪、司空見慣，但不同觀點的爭拗、不同訴求的堅持又必須以法治、以社會整體利益為依歸。作為依法行政公權力的特區政府，要掌握好這條綫、掌握好這個度，賞罰嚴明、寬嚴適當，揚長避短、趨利避害；社會各界亦應遵法守法，在多元進程中堅持核心價值觀的適時適度導向。

## (二) 矛盾轉化觀

哲學界探討的對立統一規律，實際上亦即矛盾轉化規律。矛盾、分歧、鬥爭，在人類社會實踐中向來是多發性現象。由於利益不同、價值觀不同，看問題立場角度不同，既使同類事物都可能不同認知，更何況有些事物、有些現象本身就具有對抗性。社會現實再複雜再多變，人們也要正確面對並嘗試找出合理解決辦法，找出矛盾的平衡點，這就考驗、檢驗行為主體認知矛盾、解決矛盾的本領。明智的選擇是：政治類問題靠政治智慧解決，經濟類問題靠經濟智慧解決，文化類問題靠文化智慧解決。一方面，這是事物本身性質使然，孰優孰劣、孰長孰短，經此長彼消、此消彼長即量變到質變過程自然向積極方面轉化；另一方面，則是對事物規律性的判斷、掌握，包括認識論、方法論掌握上的經驗、技巧，這也是關鍵時刻不誤戰機、走出困局的成功之本。

## (三) 奮進常態觀

不時見到一些年輕朋友不滿現實、自命不凡，抱怨學非所用、懷才不遇。其實，順景與逆境、成功與失敗之間往往是一念之差、一綫之遙。一時一事的過分計較往往對長遠生涯規劃的實現帶來難以逆轉的負面影響。每個人可以施展才幹、充分發揮的生命旅程不外乎幾十年光景，這中間既要向自然現象抗爭又要同命運拼搏。從時間維度觀察，一年春夏秋冬四季不可能日日陽光普照、風和日麗；從空間維度觀察，個人與社會、特長與需要、自我評定與外界認可從來都是雙向互動選項。你有條件也有可能，但別人未必看中；你不想幹不願幹，偏偏要無可奈何地免為其難

去幹。總之，有陰有晴、有種有收、有困難有堅守、有開拓有回報，爭取在有利時充分發揮，在不利時不忘堅持積累，自己為自己創造行動的主動權，倡導正確抗爭觀，強調奮進常態化，應是符合規律的理性選擇。“人類社會本身某種意義上講就是無時不在的博奕場，在社會大舞台上健康力量與非健康力量在博奕，文明行為與非文明行為在博奕。政治領域是圍繞一個‘權’字在博奕，經濟領域是圍繞一個‘錢’字在博奕，文化領域是圍繞是與非、對與錯，即圍繞真善美與假惡醜的判斷價值在博奕。”<sup>24</sup> 作為有思維能力的生命體，每個人都應理解、認同付出與索取、追求與滿足、奉獻與感恩之間的互動互促即對立統一關係。

## (四) 求同存異觀

大千世界，光怪陸離，無奇不有。無論政治經濟還是文化社會，無論制度法律還是民俗民風，無論政治認同還是宗教信仰，無論相互之間是肌體內部，都存在表現形式的不同和認知的差異。有的是民族文化傳統使然，有的是約定俗成，有的是利益驅動。在多元面前，尊重理解、平等相待、共同受益，本是最佳期盼和明智選擇。遺憾的是，雖然人類文明早已進入太空和信息傳時代，但仍不難見到一些高端人物依然死抱着唯我獨尊、唯我獨享的自私自心，死抱着非此即彼的“零和”思維不放，把制度之間、國家之間的差異置於不可調和的危險境地，其結果既把世界搞亂了，也令自身惶惶不可終日。

環顧當今世界各種爭議、衝突的原始肇因，不外乎一是利益驅動，“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二是理念認知的缺位失據，有時平民百姓理解的大道理，某些為政者為官者卻未必弄懂。故此，進一步倡導求同存異觀，求大同存小異、化小異為大同、有同有異、多元共生、美美與共，是協調對立雙方解決矛盾的科學而有益的选择。60年前新中國成立之初周恩來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推出涉兩大基本社會制度間對立統一大原則的“一國兩制”偉大構想。這充滿政治智慧的辯證唯物認識的重大創新，是對人類文明事業的地標式貢獻。

人類文明功史一再表明，對立、矛盾雙方可以用傳統思維、傳統模式來判斷、來處理、來對待，也可以用嶄新的開放型、和諧型思維來化解、來求同、來共贏。如今，一個日漸成熟或初步成功的驗證模式業已出現，這就是正在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全面

實踐並業已取得階段性驗證成效的“一國兩制”發展模式。在繼續推進特區“一國兩制”事業進程中，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維護特區長期繁榮穩定的根本宗旨和目標的前提下，進一步調整與強化包括對立統一規律在內的科學認識論十分必要，其中求同存異、互利共贏原則，知行合一、實踐真知原則，揚長避短、趨利避害原則，洋為中用、外為我用原則，恐應成為特區上下認知調整的基本要求。

## 四、兩大社會制度間的幾次成功對接

### （一）二戰期間斯大林與羅斯福、邱吉爾的合作

拋開對斯大林歷史功過的評價，在事關人類命運大抉擇的二戰期間，他作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掌舵人在與盟軍一方，即兩個最具影響力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羅斯福總統和英國邱吉爾首相之間，由 1943 年 11 月至 1945 年 7 月先後舉行德黑蘭會議、雅爾塔會議、波茨坦會議，並正式簽署雅爾塔協定、波茨坦公告，這一連串行動導致史稱“雅爾塔體系”的國際關係體系的建立。1943 年 11 月蔣介石與羅斯福、邱吉爾舉行開羅會議達成的開羅宣言，亦經斯大林簽署同意後公佈。儘管雅爾塔協定因無中方參加所作涉及中國決定對中國人民很不公平，但代表兩大社會制度最具影響力的三大巨頭間歷史性地走在一起並建立同盟合作體系，不僅直接推動戰勝希特勒法西斯主義和日本軍國主義，而且也為戰後國際新秩序奠定了基礎。歷史不應忘記這極不尋常的重要一頁。

### （二）毛澤東、周恩來與尼克松的北京握手

20 世紀 70 年代初國際形勢發生了一系列深刻變化，中美關係進入了新的調整期。素以反共出名的美國第 37 屆總統尼克松，作為資本主義世界頭號代言人親飛北京，同業已採取不同於前蘇聯發展道路的社會主義中國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握手言和，美方在《中美聯合公報》裏更巧妙地表示：“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sup>25</sup> 世界上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大國和世界人口最多尚處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正式建立起互相尊重的雙邊關係，其意義與影響均為國際關係史上罕見。兩個不同社會制度大國領導人的“跨太平洋握手”表明：各自發展道路由各國的人民所選擇，但相互間不僅各自利害所在不同、各自政治法律制度不

同，而且同時還存在諸多共同關注點和共同利益點；兩者間應該也可能建立起較為規範化的雙邊正常關係。顯然，這一事件也改寫了當代以制度劃分的世界政治版圖和新型國際關係史。

### （三）國共兩黨間的歷史性對話

分別代表百年來中國資本主義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兩個最大政黨——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曾有過兩次來之不易的合作：其一是 1924 年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後吸納中共代表參加並籌組全面北伐的合作；其二是 1937-1945 年間兩黨推動組成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聯合抗戰並最終戰勝日本侵略者。

中共一方早在 20 世紀 50 年代便倡導雙方進行第三次合作，共同推進祖國和平統一。30 多年前鄧小平明確指出：“問題的核心是祖國統一。和平統一已成為國共兩黨共同語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我們希望國共兩黨共完成民族統一，大家都對中華民族作出貢獻。”<sup>26</sup>

2005 年 4 月在國民黨丟掉在台管治權後的緊要關頭，應當時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之邀，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開創被稱為“破冰之旅”的大陸行，雙方在北京實現了國共分裂後 60 年來首次零距離接觸，同時開啟了兩黨間新形勢下的和解合作新局面。2008 年國民黨在台重新執政後至今 5 年來經雙方官方授權的海協會和海基會頻頻接觸，每年在兩岸定期會晤商談，簽署包括 ECFA 在內的近 20 項重要協定，實現了兩岸間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的全面“三通”，在兩岸各自堅持的不同社會制度下為雙方和平發展和人民福祉創造巨大發展空間，族情、親情以及共同的發展願景正在轉化成巨大物質力量。衝破內外阻力並最後實現國家統一與民族復興，看來只是時間遲早問題。

## 五、鄧小平以對立統一規律認識論解決當代突出發展主題，舉世無雙

人類五千年文明發展史證明，發展、進步是一條永無止境的演進長河，發展發展再發展、進步進步再進步，既是客觀要求又是主觀追求；人類文明史也證明，每個國家國情不同、發展階段不同、文化傳統不同，因而決定走甚麼樣發展道路、堅持甚麼樣社會制度，完全由這個國家的人民大眾來選擇；人類文明史

還證明不同國家不同發展模式的優與劣、先進與落後，不是取決於其領導人的表白和承諾，而是要由社會實踐來檢驗。

### （一）鄧小平的社會主義觀

破解在經濟文化落後的大國“甚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世紀性難題，是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加速中國現代化偉大事業的重大理論建樹之一，是鄧小平建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中的一項核心主題。

鄧小平沒有拘泥於純傳統理論的爭議，而是用最通俗不過的形象化語言來表徵涉當代最突出、最核心的對立統一認識論的一大難題：“社會主義是甚麼？它與資本主義本質區別是甚麼？”他開門見山、一針見血地指出：①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②平均主義不是社會主義，兩極分化也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最終目標是共同富裕。③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④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民主是社會主義的重要政治特徵。⑤沒有精神文明就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社會主義的重要思想文化特徵。⑥沒有改革開放不是真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只有在同資本主義和平競爭、和平發展中方能展示出無與倫比的優越性和競爭力。⑦在強大社會主義主體單一制前提下允許局部特殊地區保留原有資本主義，這項“一國兩制”是迄今涉兩大基本社會制度對立統一的最大膽嘗試、最深刻創新。⑧堅持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現普通真理與具體實際相結合即兩者的對立統一，走中國自己的道路，從中國國情出發，以“三個有利”標準回應長期以來姓“資”姓“社”的爭論。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奠基人，鄧小平的建樹和貢獻在當代無人超越，以下分別從幾個方面加以討論。

### （二）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富裕不是資本主義專利

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在總結新中國第一個30年發展經驗與教訓基礎上一針見血地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sup>27</sup>“不要光喊社會主義的空洞口號，社會主義不能建立在貧窮的基礎上。各國情況不同，政策也應該有區別。”<sup>28</sup>“我們堅持社會主義，要建設對資本主義具有優越性的社會主義，首先必須擺脫貧窮。”

“現在雖說我們也在搞社會主義，但事實上不夠格。只有到了下世紀中葉，達到了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才能說真的搞了社會主義，才能理直氣壯地說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sup>29</sup>“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講，正確的政治領導的成果，歸根結底要表現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上，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社會主義國家生產力發展的速度比資本主義國家慢，還談甚麼優越性？”<sup>30</sup>實現20世紀末經濟翻兩番，達到小康水平，“這不但是給佔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條路，更重要的是向人類表明，社會主義是必由之路，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sup>31</sup>

面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社會制度的對立，同時也基於對新中國前30年社會主義建設成功與失誤的分析，鄧小平一語道破一個基本認知：要解決兩大社會制度孰優孰劣的爭辯，不集中精力突破經濟上的落差，就不能在這場競爭中立住腳跟，就不能有效地展示出社會主義優越性，就是“事實上的不夠格”。反過來講，把西方資本主義絕對化，把資本主義同富裕、先進劃上等號，也不能被認為是合理的，兩大制度間新一輪較量還剛剛開始。如果十八大確立的實現“中國夢”兩步走的宏偉目標得以相繼實現，那麼30年前開啟的改革開放大潮被認定為可以同500年前造就一個現代資本主義的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媲美。當代思想大解放，絕對不是沒有根據的合理預判。

### （三）平均主義不是社會主義，共同富裕不可能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實現

鄧小平根據建國近30年社會主義建設正反經驗總結，以及他分別前往美國、日本出席國際會議或訪問期間所見所聞，及時而果斷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sup>32</sup>“社會主義原則，第一是發展生產，第二是共同致富。我們允許一部分人先好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好起來，目的是更快地實現共同富裕。”<sup>33</sup>“我們搞的四個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決大家的困難，才能避免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sup>34</sup>“我們有我們的責任，要對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負責，要發展經濟，使他們生活得更好。”<sup>35</sup>“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

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sup>36</sup>

兩極分化是有史以來未曾解決的頭號社會問題，但強調讓一部分先富、強調共同富裕不等於搞平均主義，由少數人先富到全民富裕、由低標準富裕到高標準富裕，這是追求富裕的必然過程。強調共同富裕不等於鼓勵懶漢、反對艱苦創業。改革開放之前，社會主義優越性之所以未能得到充分展示，除主要領導人不恰當地過多發動政治運動，因而延誤了寶貴的發展機遇、耗盡了國家有限積累外，對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勵精圖治、公平公正的理解缺位，對平均主義、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一類歪風邪氣抵制無力，也是認識上的原因。“寧要社會主義一棵草，不要資本主義一株苗”，就是過去“極左”思潮泛濫、指導思想僵化的最好寫照。

#### （四）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不是確定“姓資、姓社”依據

鄧小平高屋建瓴抓住問題實質、指出發展方向，他的“三個有利”判斷標準，即國計民生能否雙見效是衡量兩大社會制度孰優孰劣的關鍵點。

“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sup>37</sup>“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sup>38</sup>“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嘛。只要對發展生產力有好處，就可以利用。它為社會主義服務，就是社會主義的；為資本主義服務，就是資本主義的。”<sup>39</sup>“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sup>40</sup>

沒有理順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之間的對立統一關係，是改革開放前令中國發展陷入困境的一個關鍵性因素。這表明，很長一段歷史時間內既未真正弄懂資本主義基本屬性也未真正弄清楚社會主義基本屬性。如今早已補充為中國憲法規範的這項認知，不僅逐步成為國人深入改革開放的座右銘，而且更實實在在地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一步步走向發達境界，某種意義上講，中國已逐步在兩大社會制度的和平競賽中開始佔據上風。

#### （五）國權、民權應該也可以兼顧

在國際強權大軍壓境下絕不示弱，是鄧小平關注國是的一貫風格；面對貌似不可一世的誤判對手，鄧小平淡定自若、居高臨下，有理有據，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長城。他堅定地表示：“關於主權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迴旋餘地。坦率地講，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sup>41</sup>“中國能不能頂住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壓力，堅持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關鍵就看能不能爭得較快的增長速度，實現我們的發展戰略。”<sup>42</sup>“中國永遠不會接受別人干涉內政。我們的社會制度是根據自己的情況決定的，人民擁護，怎麼能夠接受外國干涉加以改變呢？”<sup>43</sup>“中國的特點是建國四十多年來大部分時間是在國際制裁之下發展起來的。我們別的本事沒有，但抵抗制裁是夠格的。”<sup>44</sup>“別國的事情我們管不了，中國的事情我們就得管。中國不搞社會主義不行，不堅持社會主義不行。”<sup>45</sup>

鄧小平的科學判斷來源於對事業的忠誠，來源於對人民的信任。他擲地有聲地強調：“中國人民不怕孤立，不信邪。不管國際風雲怎麼變幻，中國都是站得住的。”<sup>46</sup>“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鎖、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國。”“建國以後，我們處於被孤立、被封鎖、被制裁的地位有幾十年之久。但歸根結底，沒有損害我們多少。為甚麼？因為中國塊頭這麼大，人口這麼多，中國共產黨有志氣，中國人民有志氣。”<sup>47</sup>“甚麼威脅也嚇不倒我們。我們這個黨就是在威脅中誕生的，在威脅中奮鬥出來的，奮鬥了二十八年才真正建立了人民共和國。現在我們總比過去好得多。只要中國社會主義不倒，社會主義在世界將始終站得住。”<sup>48</sup>“別人的事情我們管不了，只講一個道理：中國的社會主義是變不了的。中國肯定要沿着自己選擇的社會主義道路走到底。”<sup>49</sup>

鄧小平強調國權與人權要兼顧、國格與人格要結合，他說：“中國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熱愛祖國、貢獻全部力量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為最大光榮，以損害社會主義祖國利益、尊嚴和榮譽為最大恥辱。”<sup>50</sup>“中國人民珍惜同其他國家和人民的友誼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經過長期奮鬥而得來的獨立自主權力。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sup>51</sup>“人們支持人權，但不要忘記還有一個國權。談到人格，但不要忘記還有一個國格。特別是像我們這樣第三世界的發展中國家，沒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獨立，國家是立不起來的。”<sup>52</sup>

國權亦即國家的權、全國人民的權，或講具體一些，國權就是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這是一項沒有迴旋餘地、不可以討論的原則性問題。一方面，在 20 世紀末之前涉國家主權的香港、澳門問題必須妥善解決，既使回歸後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維護中央管治權威，正確處理中央與特區之間的互動關係依然不容掉以輕心；另一方面，在國家對香港澳門恢復行使主權後又必須長期保持其繁榮穩定，這事關特區廣大居民基本福祉和對未來信心指標的提升。這中間就有個原則堅定性和政策靈活性的對立統一問題。

人權亦即民權，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公民基本權利和自由是否得到有效保障，這是檢驗國體政體、國家基本政治制度規範性、法制性、科學性、適用性的出發點和落腳點。2004 年修憲時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憲法第 33 條，使之成為憲政保障之一。2011 年 2 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刑法修正案(八)》，取消 13 個經濟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死刑罪名削減幅度近 1/5。中國政府已經加入包括《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在內的 27 項國際人權公約。<sup>53</sup> 中國近 20 年間共發表 10 部人權白皮書，平均每兩年有 1 部。中國的人權思想和人權發展戰略始終把生存權和發展權作為首要人權或置於各項人權首位，這是有中國特色的人權保障之路。堅持國權和人權的對立統一、堅持國格和人格的對立統一，是當代中國人尤其是生活在特別行政區的中國公民應該建立的基本人權觀。

#### (六) 民主、法制還有頗大提升空間

鄧小平根據對歷史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十分強調法治反對人治，他不僅不過分看中名義領導人的光環，而且親自開創國家領導人非終身制先河，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重視令人敬佩。

“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sup>54</sup> “現在的問題是法律很不完備，很多法律還沒有制定出來。往往把領導人說的話當做‘法’，不贊成領導人說的話說叫做‘違法’，領導人的話改變了，‘法’也就跟着改變。”<sup>55</sup> “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sup>56</sup> “關於民主，我們大陸講社會主義民主，和資產階級民主的概念不同。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權分立，多黨競選，等等。我們並不反對西方國家這樣搞，但是我們中國大陸不搞

多黨競選，不搞三權分立、兩院制。”<sup>57</sup> “再如民主集中制也是我們的優越性。這種制度更利於團結人民，比西方的民主好得多。我們做某一項決定，可以立即實施。”<sup>58</sup> “我們要反對腐敗，搞廉潔政治。不是搞一天兩天、一月兩月，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sup>59</sup>

中國已建立起作為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作為基本政治制度的中共領導下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這四大制度均首創在中國並不斷完善在中國。而在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實行的特別行政區制度更是獨具中國特色，它在維護國家主權前提下橫跨兩大社會制度，如今順利啟動後已初見成效。

任何一個國家的民主都處動態演進過程中，同理，一個國家的法制建設既要保持相對穩定又要跟上形勢、與時俱進，因此，民主與法制從不存在絕對的標準，每個國家都要從自身現實出發加以推進，以確保公民基本權利和自由真正得到有效維護。中國內地民主、法制至今仍存較大缺口是事實，不容否認，但台灣與香港某些人自認高明，說甚麼台灣政治文明已晉國際水平，“以量取勝的大陸腐敗文化，就迅速侵蝕香港原有核心價值”，故要求“香港不能大陸化，而要大陸香港化”。<sup>60</sup> 經營這類言論在港台還有不少的市場，但也不能不指出其偏頗性、無知性。民主、法制作為人類文明成果，理應全球共享，但一要區別對待，各國各地國情區情不同、發展階段不同，怎能千篇一律以某一特定判斷為惟一標準；二要尊重當地人民選擇，不能越俎代庖；三要把自己擺在適當位置，不能像美國人一樣，自己國內人權、民主問題成堆，偏偏熱衷於挑釁別人是非。

#### (七) 改革開放是一篇要抓住不放的大文章

社會主義出現、成長在資本主義包圍的環境中，兩大社會制度不是同時起步，資本主義幾百年來積累的物質財富和科技文化是人類文明的共同成果，即使從競爭、較量觀點出發，也應做到知己知彼，故此，鄧小平大聲疾呼：“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sup>61</sup> “我們吸收資本主義中一些有用的方法來發展生產力。現在看得很清楚，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搞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進行一系列的體制改革，這個路子是對的。”<sup>62</sup> “如果沒有

共產黨的領導，不搞社會主義，不搞改革開放，就嗚呼哀哉了，哪裏能有現在的中國？用二十多年流血鬥爭贏得的人民共和國，用幾十年艱苦奮鬥特別是十年來改革開放贏得的社會主義建設成就，中國人民不會把它輕易丟掉。”<sup>63</sup>“改革開放要貫穿中國整個發展過程，不是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也不是二十年，因為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sup>64</sup>

改革開放是特殊國情、特殊歷史逼出來的，看不到這步棋不對，決心、氣魄不夠也不行。萬幸的是，在歷史轉折關頭，有總設計師在高瞻遠矚地引路。“二十年的經驗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告訴我們，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政策不行。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了這樣的一系列方針政策，走上了新的道路。這些政策概括起來，就是改革和開放。”<sup>65</sup>“建設一個國家，不要把自己置於封閉狀態和孤立地位。要重視廣泛的國際交往，同甚麼人都可以打交道，在打交道的過程中趨利避害。用我們的話講，叫對外開放。”<sup>66</sup>“中國要謀求發展，擺脫貧窮和落後，就必須開放。開放不僅是發展國際間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國際的經驗。”<sup>67</sup>“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sup>68</sup>“我們的開放政策肯定要繼續下去，現在是開放得不夠。我們的開放、改革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膽子要大，要堅決。不開放不改革沒有出路，國家現代化建設沒有希望。”<sup>69</sup>

實踐出真知，發展是硬道理，秉承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獨立思考、與時俱進的科學認知，鄧小平的社會主義觀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所掌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實踐是檢驗路綫、方針、政策是否正確的惟一標準。”<sup>70</sup>“善於總結‘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提出一些改革措施，從政治上、經濟上改變我們的面貌，這樣壞事就變成了好事。”<sup>71</sup>“過去耽誤太多，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自己找麻煩，自己遭災，不過教訓總結起來很有益處。現在的方針政策，就是對‘文化大革命’進行總結的結果。”<sup>72</sup>“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這樣的事，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來，列寧的本本上也找不出來，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情況，各自的經歷也不同，所以要獨立思考。”<sup>73</sup>“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sup>74</sup>“搞這些改革，走這樣的路，已經給我們帶來了可喜的結果。中國不走這條路，就沒有別的路可走。只有這條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榮之路。”<sup>75</sup>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以鄧小平為首的國家領

導人痛定思痛、力挽狂瀾，除改革開放外，中國沒有其他選擇。鄧小平決心之大、推出之及時、方法之靈活，有目共睹、有口皆碑，他的“摸論”（摸石頭過河）、“貓論”、“硬論”（發展是硬道理）、“闖論”（看準了的，大膽地試，大膽地闖）等等是如此生動、如此形象，一下子被全民所理解，迅速轉換成改天換地的物質力量。35年過去了，這段改革開放歷史不僅改寫了中國人民命運，提振了民族自信心、自尊心與凝聚力，令中國人在經濟上翻了身、在政治上直起腰，而且也向全球證明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寬廣。

開放的時代、開放的特別行政區，要求人們建立相應的開放思維。在過去的1/3世紀裏，中華人民共和國靠改革開放走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路，祖國河山和人民命運同步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正如習近平所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所以具有蓬勃生命力，就在於實行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我國過去三十多年的快速發展靠的是改革開放，我國未來發展也必須堅定不移依靠改革開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改革開放中產生，也必將在改革開放中發展壯大。”<sup>76</sup>

#### （八）社會主義的中國特色論

明確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科學回答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成功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鄧小平在中國人民面前建立的歷史性功勳。這是改寫當代中國史以至改寫當代世界文明史的中國第一人。

讓我們重溫一下鄧小平一系列令人發聾振聵的論斷：“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sup>77</sup>“我們多次重申，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但是，馬克思主義必須是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必須是切合中國實際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sup>78</sup>“中國搞社會主義，強調要有中國的特色。我們堅信馬克思主義，但馬克思主義必須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只有結合中國實際的馬克思主義，才是我們所需要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sup>79</sup>“我們的原則是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的實踐相結合，走中國自己的道路，我們叫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sup>80</sup>“我們搞的現代化，是中國式的現代化。我們建設的社會主義，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sup>81</sup>“我們搞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不

斷發展社會生產力的社會主義，是主張和平的社會主義。只有不斷發展社會生產力，國家才能一步步富強起來，人民生活才能一步步改善。”<sup>82</sup>

包括“一國兩制”理論在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絕對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它令當代中國億萬人民直接受益，它也必然導致國際社會對社會主義制度加以重新檢視。“今天的中國處於1840年以來最好的時期，今天的中國有1840年以來最好的制度，今天的中國是全球各主要國家中發展最好的國家。”<sup>83</sup> 如果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標誌着“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那麼迄今為止改革開放過程中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已讓中國人初步富起來；如果說當前的初富還只是實現“中國夢”的階段性成果，還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那麼，十八大設定的“兩步走”規劃的實現必將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社會制度的馬拉松式比拼進一步分出高低上下。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核心概念是社會主義，是仍處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而其根本標誌是中國特色，亦即實事求是，一切從中國國情出發，從13億人的共同利益和願望出發。如果說剩餘價值論奠定了馬克思作為理論家、思想家的歷史地位，那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則成為開創當代世界最大規模社會主義實踐總設計師鄧小平的理論高峰。

## 六、“一國兩制”理論進入全面驗證的成熟期

### (一)“一國兩制”歸功於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

鄧小平親自設計的“一國兩制”理論，把兩大制度間傳統勢不兩立對立關係推向一個對雙方不傷反益的新階段。他反覆強調：“我們的政策是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具體說，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十億人口的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台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sup>84</sup> “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這個特色，很重要的一個內容就是對香港、澳門、台灣問題的處理，就是‘一國兩制’。” “這個新事物不是美國提出來的，不是日本提出來的，不是歐洲提出來的，也不是蘇聯提出來的，而是中國提出來的，這就叫做中國特色。”<sup>85</sup>

“實現國家統一是民族的願望，一百年不統一，一千年也要統一的。怎麼解決這個問題，我看只有實

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世界上一系列爭端都面臨着用和平方式來解決還是用非和平方式來解決的問題。總得找出個辦法來，新問題就得用新辦法來解決。香港問題的成功解決，這個事例可能為國際上許多問題的解決提供一些有益的綫索。”<sup>86</sup>

實行這個制度，無論香港、澳門還是台灣都是有得無失、有利無弊，至少是得大於失、利大於弊。鄧小平說：“祖國統一後，台灣特別行政區可以有自己的獨立性，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制度。司法獨立，終審權不須到北京。台灣還可以有自己的軍隊，只是不能構成對大陸的威脅。大陸不派人駐台，不僅軍隊不去，行政人員也不去。台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都由台灣自己來管。中央政府還要給台灣留出名額。”<sup>87</sup> “我們採取‘一國兩制’的方式解決統一問題。大陸搞社會主義，台灣搞它的資本主義。這對台灣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不會改變，台灣人民沒有損失。”<sup>88</sup>

“我們解決香港問題，允許香港保留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解決台灣問題也是這個原則。台灣跟香港不同，還可以保留軍隊。”<sup>89</sup> “我們搞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所以才制定‘一國兩制’的政策，才可以允許兩種制度存在。”<sup>90</sup> “如果‘一國兩制’的構想是一個對國際上有意義的想法的話，那要歸功於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用毛澤東的話來講就是實事求是。”<sup>91</sup>

“一國兩制”的國際意義不容低估。鄧小平說：“現在進一步考慮，和平共處的原則用之於解決一個國家內部的某些問題，恐怕也是一個好辦法。根據中國自己的實踐，我們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的統一問題，這也是一種和平共處。”<sup>92</sup> “‘一國兩制’，是從我們自己的實際提出來的，但是這個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國際問題的處理上。好多國際爭端，解決不好會成為爆發點。”<sup>93</sup>

小範圍內的資本主義有利於大範圍的社會主義。鄧小平說：“如果用社會主義來統一，就做不到三方面都接受。勉強接受了，也會造成混亂局面。即使不發生武力衝突，香港也將成為一個蕭條的香港，後遺症很多的香港，不是我們所希望的香港。”<sup>94</sup> “主體是很大的主體，社會主義是在十億人口地區的社會主義，這是個前提，沒有這個前提不行。在這個前提下，可以容許在自己身邊，在小地區和小範圍內實行資本主義。我們相信，在小範圍內容許資本主義存在，更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sup>95</sup> “‘一國兩制’也要講兩個方面。一方面，社會主義國家裏允許一些特

殊地區搞資本主義，不是搞一段時間，而是搞幾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確定整個國家的主體是社會主義。”<sup>96</sup>“中國的形象如何還是要看大陸，中國的發展趨勢和前途也在大陸。”<sup>97</sup>

## （二）最形象、最深刻的理論創新與制度創新

在一個實行單一制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局部特殊地區保持原有資本主義制度 50 年不變，這在近百年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共生共存時代，不僅政治家、思想家甚至學術界亦是未曾觸及過的嚴肅課題，如今業已得到富有成效、富有啓迪的妥善解決，說它是文明史上最大的理論創新與制度創新，絕不為過，把它認定為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一門顯學，當之無愧。其基本理據是：①它有嚴謹、系統的研究對象和範圍，包括國家主權論、兩制共存論、澳(港)人治澳(港)論、高度自治論、政策穩定論、長期示範論等；②它直接涉及政治學、法學、國際關係學、國防學、經濟學、歷史學、社會學、哲學、心理學、美學等諸多基礎學科；③它有憲法規範的授權與保障，並通過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加以法制化、系統化，形成目標明確且具可行性、可控性、可操作性的特別行政區制度；④它早已轉換成兩個特別行政區的活生生現實，其實踐充分驗證了這一新興發展模式的科學性、生命力、優越性、啓示性。

## （三）香港特區率先垂範的路不易走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國第一個實行“一國兩制”的地方，也是國際化、自由度最高的中心城市。香港不僅在經濟上是世界著名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旅遊中心，在文化上是中西交匯最成功、最典型的範例，而且在政治上開創了“一國兩制”、“港人自港”、高度自治先河，有效地維護了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成為新時代新形勢下思維創新、制度創新的風向標。當然，16 年來，在香港也一再出現一些並非人們願意見到的消極現象。兩大社會制度之間最直接、最有代表性的嫁接、集成在這裏發生，兩者之間的消極碰撞、對抗也從未停息。應該說，香港的巨大變化不容否定，香港的率先垂範作用不容低估，香港一再發生的非理性現象也值得高度關注並引以為戒。

比澳門先行一步的香港特區密鑼緊鼓地準備、回應 2017 年首次引入的行政長官普選產生機制。這本應成為 700 萬居民皆大歡喜的一件政治盛事，但事態發展卻不盡然。本來，《香港基本法》的原則性規定

與指引已相當之清晰明確。回歸後的香港、澳門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都是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享有高度自治權的特別行政區。擁有這種法律定位的特別行政區，其行政長官照例應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對中央人民政府和特別行政區負責，並依法宣誓效忠於本特別行政區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就清楚不過地表明，行政長官作為新生政權頭號代言人和形象理應成為愛國愛港、忠於職守，帶領全港居民正確實踐“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確保長期繁榮穩定的新型政治家。這樣的剛性規定和要求是必須依法執行、不容打折扣的。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號稱法治國家(地區)的主要據位人可以由不認同其根本大法亦即反對其根本政治制度與社會整體利益的人出任。

國家一詞就是由國與家兩個字組成，即由大家與小家組成，兩者既是利益共同體又是命運共同體。沒有國家的強大便沒有香港、澳門的回歸，在回歸後建立的特別行政區居然有人公開反對行政長官必須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妄想挑戰中央權威，不僅邏輯上不通而且法理上也不容。這類雜音早已背離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原則，與正當的多元訴求、多元表達沒有共同點，其結果只能是香港社會要為資源的不明智消耗和發展機遇的非理性延誤“埋單”。從求同存異、對立統一思維判斷，香港依然是發育相當充分的資本主義社會，依然是全球國際化、自由度最高的城市，兩大社會制度、兩種不同價值觀體系、兩種不同文化傳統間的碰撞、抗衡、鬥爭還會長期繼續下去，某種意義上講，香港應該也必然會繼續成為“一國兩制”不可取代的試驗窗口和展示基地，並為人們擴大理性思維提供不可取代的寶貴借鑒。

## （四）變與不變

國家承諾“一國兩制”作為基本國策將長期不變，而且鄭重地寫入基本法。其實這本身就是辯證統一。兩者關係，鄧小平早已講得十分清楚。

“我國政府在一九九七年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後，香港現行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法律基本不變，生活方式不變，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國際貿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變，香港可以繼續同其他國家和地區保持和發展經濟關係。”<sup>98</sup>“我們對香港的政策長期不變，影響不了大陸的社會主義。中國的主體必須是社會主義，但允許國內某些區域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比如香港、台灣。”<sup>99</sup>“有人擔心這個政策會不會變，我說不會變。核心的問題，決定的因素，是這個政策對不對。如果不對，就可能變。如果是對的，

就變不了。”<sup>100</sup> “一個是政局穩定，一個是政策穩定，兩個穩定。不變也就是穩定。如果到下一個五十年，這個政策見效，達到預期目標，就更沒有理由變了。”<sup>101</sup> “對香港的政策，我們承諾了一九九七年以後五十年不變，這個承諾是鄭重的。為甚麼說五十年不變？這是有根據的，不只是為了安定香港的人心，而是考慮到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同中國的發展戰略有着密切的關聯。”<sup>102</sup> “實際上，五十年只是一個形象的講法，五十年後也不會變。前五十年是不能變，五十年之後是不需要變。所以，這不是信口開河。”<sup>103</sup> “要真正能做到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以後也不變，就要大陸這個社會主義制度不變。我們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要保證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不變，保證整個政策不變，對內開放，對外開放的政策不變。”<sup>104</sup>

人類社會本身就是一個充滿鬥爭、充滿變幻的萬花筒：無論制度法律，還是文化習俗，無時無刻不在動態演變過程中；多數情況都是具積極意義的正向發展進步，但違法違規的非文明行為以至倒行逆施、開歷史倒車亦不罕見。鄧小平承諾“一國兩制”可以50年不變，其目的就在於最終實現國家統一夢和民族復興夢，其高度統一的原則堅定性和政策靈活性是出自當代偉大政治家、思想家的理論自信和高屋建瓴。

當然，人們也要具體明確幾個區別：一是變與不變，按正常理解變是常態，所謂“長期不變”主要指原有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自由港地位及國際聯繫不變、法律基本不變。回歸本身就是政權性質的改變，是一場改朝換代的大變，凡有利於維護國家主權的變、有利於特區繁榮穩定的變、有利於提升居民福祉的變都是好事，都不能一概而論加以反對；二是50年內與50年後，如果50年內“一國兩制”得到成功驗證，特區獲得快速發展，國家也全面受益，那麼50年後繼續某些行之有效做法甚至延續“一國兩制”適用期恐不足為奇；三是特區的變與國家的變，特別行政區是中央政府直接管轄下的地方行政區域，在主權國家內部的法律定位是任何人士不能改變的，而特區的不變更以社會主義國家基本制度不變為前提。

#### (五) 在實踐中提升“一國兩制”實踐水平

20世紀80年代初由鄧小平親自推出的“一國兩制”偉大構想，隨即形成中國政府能解決香港回歸、澳門回歸的基本國策，經港澳兩部基本法的理論化法制化，並於世紀之交在國家對港澳先後恢復行使主權後正式建起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香港特

區16年5,800日日夜夜，澳門特區13年半4,900日日夜夜，風風雨雨相伴，儘管時而出現爭拗、抗衡，但同國旗一起高高飄揚的兩面區旗讓世界看到新興特別行政區的存在，日益高漲的愛國愛港、愛國愛澳成為特區居民主流價值觀，人們也形象地認定特別行政區是“一國兩制”科學性、生命力、優越性、可行性的有效展示平台，居民絕大多數以做特區人、中國人為榮。

以澳門特區為例，14年來斗轉星移、滄海桑田，其變化之大、進步之速，自身歷史上不曾有過，在中華民族歷史上以至國際發展史上也許均不曾有過。2012年與2000年相比，本地生產總值和人均GDP分別增長6.74倍和5.1倍，達到澳門幣3,482億元和611,930元(76,588美元)<sup>105</sup>，其中2009-2012年間人均GDP年均增長超過12,281美元，這是國際上一項罕見的快速推進記錄。三年前本人就澳門特區具奠基意義的第一個十年發展期的主要成效提出“兩大兩新兩高兩有”及“四缺”的判斷。需要充分肯定的有：經濟領域是總量大擴充、民生大改善；政治領域是實行新政治體制、引進新施政理念；社會領域保持高穩定度、高和諧度；文化領域指綜合素質有所提升、核心價值觀有所調整。有待提升的“四缺”是：高水平公平競爭機制、高公民意識、創新思維和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正確理解。故此，繼續提升對“一國兩制”的基本認知、提升對基本法權威性的認知、堅持在“一國兩制”實踐中不斷提升其實踐水平，應成為對特區居民的一項常態化發展要求。

倡導求同存異、和平共處的“一國兩制”本身，就在於最大限度地實現當代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基本社會制度的對立統一，質言之，就在於承認資本主義具可利用性、可改造性、可借鑒性、可駕馭性前提下令其舊為新用、外為中用，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服務。這本身就是改革開放基本國策的宗旨和憲法第31條的標的所在，就是建國長逾一甲子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推行改革開放新政的基本經驗之一，就是當今時代最能體現核心價值的最大膽識、最高智慧所在。

“一國兩制”的成功就在於把兩個似乎水火不相容的社會制度可以在一定社會條件下加以合理嫁接、整合、集成並進而形成有旺盛生命力和可行性、可操作性的新型社會生態。如今，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是最好的對外展示窗口、最佳的運行實驗平台。一種全新的運行制度、體制、機制不僅十多年前即已出現，而且假如可以抓住事物的本質、核心

的話，那麼特別行政區的經驗、啓示是難以取代的。它不僅對中國自身而且對國際關係的演進、發展均構成一條十分寶貴的價值鏈，展現出無與倫比的巨大理論探索空間。

#### (六) 有關優化“一國兩制”實踐模式的思考

已有 13 年實踐“一國兩制”經驗積累的澳門，應該說已為未來不斷提升“一國兩制”實踐水平打下了不錯的基礎，甚至可以講在某些方面已初步摸索出澳門特色“一國兩制”實踐模式。為了及時總結 13 年多的寶貴積累，為了推動新時代澳門全新發展模式的優化，有待進一步加大思考研究的領域和課題着實不少，其中，認真總結 13 年來實踐“一國兩制”的基本規律與經驗就十分必要，而且抓得越堅決越主動。本人認為，要做好這項工作既難又不難，說難是因為“一國兩制”事業是不折不扣的史無前例，包括行政長官在內任何人都沒有相應經歷，說不難是因為澳門開局不錯，“一國兩制”認同度一直處於高水平。關鍵在於特區上下要高度重視、形成共識並全面提升社會成員的文化自覺性。

有關對實踐“一國兩制”基本經驗的理解與體會，每個人均可做出各自不同的判斷，但以下八點恐怕尤其值得重視。

① 尊重中央管治權威，要發自內心，並感恩戴德、知恩圖報，沒有國家的強大，港澳就不能回歸，回歸之後也難以保持長期繁榮穩定；

② 倡導愛國愛澳新型價值觀，認真宣傳推介並認真實踐“一國兩制”和基本法，而且有條件人士應主動投入對其深入而系統的研究；

③ 堅持依法施政、行政主導，公權力機關要相互支持合作，相互監督制衡，全面建設廉潔政府、法治政府、民主政府；

④ 量入為出，全力改善民生，急民生所急，憂民生所憂，這既是驗證“一國兩制”優越性所需，也是“以人為本”施政理念所需；

⑤ 循序漸進，積極推廣民主，力求抓住民意、啓迪民智、維護民眾尊嚴，民主不是表面化工程而是居民實實在在的權利行使；

⑥ 力求寬鬆包容，認真求同存異，但不能放鬆開拓創新，不能靠依賴思維過日子，探索求真永無止境；

⑦ 維持多元多維，擴大開放度，但政府與民間都需把握核心價值觀導向，當仁不讓，當機立斷；

⑧ 廣結善緣，兼愛平等，主動拓寬對外聯繫渠道，主動維護特區健康形象。

## 七、結束語

在人類文明演進過程中，實踐永無止境，提升對客觀世界與主觀世界發展規律的認識也永無止境。有機會目睹、見證在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指引下我們國家和特別行政區所發生的根本性變化，是我們當代人的幸運，繼續提升對“一國兩制”理論巨大創新價值的系統認知並力求零距離地抓住其中一些關鍵性的亮點與熱點加以深入探討與推介，對於當代特區學者也義不容辭、責無旁貸。

當前，在兩大社會制度依然共存時代，在主體日益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個別局部地區允許保留原有資本主義，標誌着辯證唯物認識論領域的重大突破，標誌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成熟，這是其一。在保留原有資本主義並實行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澳門，並非樣樣都是資本主義屬性，特別行政區是社會主義中國中央政府領導下具有一定特殊性的地方行政單位，“一國兩制”是其基本屬性，故整體觀察，它不“性資”而份屬“性社”，這是其二。在新興特別行政區有必要也有條件通過資源配置、結構重組實現“兩制”的嫁接、整合、集成，建立高效的新型生產函數，推動勞動生產力穩定增長，使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區成為“三個有利”的全新展示窗口，成為制度創新的有效載體，成為社會主義利用駕馭資本主義的創新實踐平台，這是其三。

故此觀之，實行“一國兩制”不是出於權宜之計而是長期基本國策；不是無原則消極讓步而是富創意的積極進取；不是簡單的新舊更迭而是構思精密的基因再造；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新人新事而是前無古人、世所未聞的大建構、大開拓、大開放、大創新。這是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制度的成功改革與自我完善，也是科學社會主義經典理論在新形勢下的發揚光大。理解它、認同它、捍衛它、研究它，不僅直接對特別行政區而且對全國人民以至國際社會都具有極高的現實意義，認定“一國兩制”是現代憲政與法治文明的制高點絕不誇大。這項帶全民性、時代性、開拓性、示範性的全新事業，其科學性與生命力、其意義與價值已在特別行政區社會現實中展現出來。人們有理由相信，假以時日，“一國兩制”理論影響力與現實震撼力必將在海峽兩岸的和平發展最終實現國家全面統一的進程中得到充分展示和驗證，從而令國人和世人眼前為之一亮。

註釋：

- 1 吳邦國：《香港基本法實施十週年座談會上的講話》。
- 2 楊允中：《論“一國兩制”理論科學定位的必要性、迫切性》，載於《“一國兩制”研究》，2013年第1期，第6頁。
- 3 見《中國大百科全書》(精粹本)，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2年，第109頁。
- 4 同上註。
- 5 同上註，第326頁。
- 6 同上註，第104頁。
- 7 見《中國大百科全書》第十二卷，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第12-269頁。
- 8 同上註。
- 9 轉引自馬小紅、龐朝驥等：《守望和諧的法文明》，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0頁。
- 10 同上註，第22頁。
- 11 同上註，第362頁。
- 12 同上註，第68頁。
- 13 同上註，第80頁。
- 14 同上註，第85頁。
- 15 同上註，第93頁。
- 16 [法]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年，第313頁。
- 17 同註3，第1713頁。
- 18 同上註，第1713、1714頁。
- 19 同上註，第830頁。
- 20 同上註，第964頁。
- 21 同上註，第250頁。
- 22 胡錦濤：《中共十八大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頁。
- 23 宋魯鄭：《只有去中國才能看到未來》，載於《求是》，2013年第9期，第60頁。
- 24 同註2，第9頁。
- 25 見《辭海》(第六版)，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年，第2987頁。
- 26 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0頁。
- 27 同上註，第116頁。
- 28 同上註，第213頁。
- 29 同上註，第225頁。
- 30 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8頁。
- 31 同註26，第225頁。
- 32 同上註，第373頁。
- 33 同上註，第172頁。
- 34 同上註，第357頁。
- 35 同上註，第326頁。
- 36 同上註，第364頁。
- 37 同上註，第372頁。
- 38 同上註。
- 39 同上註，第203頁。
- 40 同上註，第373頁。
- 41 同上註，第12頁。
- 42 同上註，第356頁。

- 43 同上註，第 359 頁。
- 44 同上註。
- 45 同上註，第 326 頁。
- 46 同上註，第 329 頁。
- 47 同上註。
- 48 同上註，第 345、346 頁。
- 49 同上註，第 320、321 頁。
- 50 同上註，第 3 頁。
- 51 同上註。
- 52 同上註，第 331 頁。
- 53 見《人民日報》(海外版)，2013 年 5 月 15 日，第 5 版。
- 54 同註 30，第 145 頁。
- 55 同上註。
- 56 同上註，第 168 頁。
- 57 同註 26，第 220 頁。
- 58 同上註，第 257 頁。
- 59 同上註，第 327 頁。
- 60 見《明報》署名文章，2013 年 5 月 8 日，第 A32 版。
- 61 同註 26，第 373 頁。
- 62 同上註，第 149 頁。
- 63 同上註，第 326 頁。
- 64 同上註，第 265 頁。
- 65 同上註，第 266 頁。
- 66 同上註，第 260 頁。
- 67 同上註，第 266 頁。
- 68 同上註，第 372 頁。
- 69 同上註，第 219 頁。
- 70 同上註，第 28 頁。
- 71 同上註，第 172 頁。
- 72 同上註，第 223 頁。
- 73 同上註，第 260 頁。
- 74 同上註，第 370 頁。
- 75 同上註，第 149、150 頁。
- 76 習近平：《在十八屆一中全會上的講話》，載於《求是》，2013 年第 1 期，第 7 頁。
- 77 同註 26，第 3 頁。
- 78 同上註，第 63 頁。
- 79 同上註，第 213 頁。
- 80 同上註，第 135 頁。
- 81 同上註，第 29 頁。
- 82 同上註，第 328 頁。
- 83 同註 23，第 56 頁。
- 84 同註 26，第 58 頁。
- 85 同上註，第 218 頁。
- 86 同上註，第 59 頁。

- 87 同上註，第30頁。
- 88 同上註，第170頁。
- 89 同上註，第97頁。
- 90 同上註，第217頁。
- 91 同上註，第101頁。
- 92 同上註，第96、97頁。
- 93 同上註，第87頁。
- 94 同上註，第101、102頁。
- 95 同上註，第103頁。
- 96 同上註，第219頁。
- 97 同上註，第358頁。
- 98 同上註，第58頁。
- 99 同上註，第59頁。
- 100 同上註，第59頁。
- 101 同上註，第217頁。
- 102 同上註，第267頁。
- 103 同上註。
- 104 同上註，第218頁。
- 105 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本地生產總值》(2012)，澳門：澳門統計暨普查局，2013年，第46頁。